

# 论德里达语言哲学的解构性

苏 琪

( 山东大学 济南 250100; 枣庄学院 枣庄 277160)

**提 要:** 德里达的语言哲学是在解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反对封闭的二元对立系统。德里达语言哲学的解构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对符号意义观的解构,颠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和等级结构,使事物之间、等级结构的两极之间变得自由和流动;通过对语音中心论的解构,消解语音统治书写的这种等级森严的语音中心主义,建立起事物间的二元互补而非二元对立的新型关系;通过解构索绪尔语言学关于语言是封闭稳定结构的论述,打破结构主义语言哲学静态的、共时的和封闭的语言系统研究,追求语言研究的动态特征。

**关键词:** 德里达; 语言; 哲学; 解构

中图分类号: B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5)02 - 0014 - 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 - 1071/h.2015.02.003

## On the Deconstructional Traits of Derrida's Linguistic Philosophy

Su Qi

(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277160, China)

Derrida's linguistic philosophy is based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Saussure's structuralism with the key point of opposing the closed binary opposition. The deconstructional traits of Derrida's philosophy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firstly, it subverted the binary opposition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semiotic semantics; secondly, it destroyed the centrism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phonocentrism; thirdly, it collapsed the static and synchronic study of language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text isolatedness.

**Key words:** Derrida; language; philosophy; deconstruction

德里达的语言哲学建立在解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其核心观念是把语言看成一个封闭的结构体、一个以任意性为基础有层级的符号系统。德里达则致力于消解各种中心,颠覆二元结构和等级结构,使事物之间、等级结构的两极之间变得自由和流动。目前,对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论著很多,但是对于其如何系统地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解构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着重分析德里达语言哲学的解构性,即德里达语言哲学如何系统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代表——符号意义观、语音中心论及语言结构封闭性。

### 1 结构主义符号意义观的解构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家一直认为存在着

某种终极的、客观的、外在的中心,这就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哲学是一种典型的在场形而上学。作为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抵触,他的语言哲学就是要消除这种终极的、客观的、外在的中心,其核心内容是反对一元中心和消解二元对抗(杜小真 张宁 2003: 34)。根据西方哲学传统,事物的基本关系是二元对立的。但是,二元对立项的地位不平等,总有一项被尊崇,而另一项被贬斥,比如人们总是推崇中心、理性、本质,而对边缘、差异、异端则总是加以排斥。德里达认为这种形而上学的中心观念有很多弊端:首先是结构的封闭性。由于中心是恒定的,围绕中心的结构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使人们倾向于静态地看待事物并造成事物发展的停滞。其次是结构的封闭性导致意义的确定性,确定性与

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紧密相连。事物总是被先验所指赋予意义,由于结构的封闭性使这种意义的确定性不再容纳新的意义。同时,这也体现为对新事物的排斥和对旧事物的推崇,这种意义的确定性必将束缚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最后是中心对边缘的压制,二元对立项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体现为中心对边缘的压制,表现为社会、种族以及人际与国际关系的不平等。为扫除形而上学中心观念所带来的弊端,德里达语言解构思想的锋芒首先指向形而上学的中心观念,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上的集中体现:符号意义观。如前所述,索绪尔的符号意义观视语言为一个符号体系,语言符号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索绪尔 1999: 101)。索绪尔用能指和所指分别指代音响形象和概念。任何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统一体。在所指与能指的二元对立中,所指和能指的地位不平等。能指的存在是为了体现所指,使意义得以凸显。也就是说,能指的存在是以所指的存在为前提,所指决定能指。所指是中心,是目的,是二元对立中处于决定性的一方;而能指反映观念,是二元对立中被决定的一方。

“逻各斯中心主义”来源于古希腊语 *logos*,意为“语言”或“定义”。西方哲学普遍认为“逻各斯”是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或世界本源的观念。德里达认为,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典型例证,是一个以所指为中心的二元对立体系(Derrida 1982: 39)。他认为,不能用静止的观念看语言中的区分。这是因为每一个能指的意义都需要借助其他的能指加以区分,因而没有终极的意义。德里达发现并不是每一个能指的背后都有一个所指如影随形,能指的背后往往是另一个能指。在文本里,随着能指不断增加,意义不断被推延,似乎永远不会有终极的意义,因此文本的意义必然在动态中变化。“意义的意义”是能指的游戏,是能指的无限指涉,因此,语言中只有能指,没有所指。由此德里达彻底解构作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支柱的符号意义观。德里达解构符号意义观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彻底颠覆存在于符号意义观内的、基于二元对立的、有等级差异的“逻各斯中心主义”。(Derrida 1982: 27)

德里达语言哲学上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并非局限在语言内部,而是指向代表西方霸权思想的西方中心论。否定二元对立是德里达语言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二元对立思维与绝对中心的

观念是一体两面。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将世界分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其中一项居于中心的地位,另外一项则在中心的对立面。它们形成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居于中心的一方总是被褒奖,而处于中心对立面的一方总是被贬斥。当这种思维与社会意识结合起来时,危害非常明显。比如代表西方霸权思想的西方中心论按照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观念对世界不同文明进行区分,由此先进的文明可以对落后的、野蛮的文明使用各种方法去“启蒙”他们。因此德里达坚决反对形而上学所设定的超验的、永恒的、概念化的中心。他认为人类有一种本能,就是将世界置于自己掌控下的欲望,然而这种本能欲望与绝对中心的观念紧密相连。比如权力的欲望与中心的观念密不可分,因为居于权力中心的力量往往会以真理的名义,使自己的优越位置永固化。德里达认为宗教迫害、君权至上、种族歧视、西方中心论全部都源自“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语言哲学对建立在符号意义观基础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为后现代主义者颠覆西方中心主义、重构平等东西方关系提供思想上和方法论的支撑。

## 2 语音中心论的解构

德里达解构主义语言哲学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另一解构对象是语音中心主义。在语音和书写这两个概念里,索绪尔的语音中心论把语音作为语言的本质,书写唯一存在的理由在于对前者的表现,是语音的衍生物。语言研究的对象不是书写和口语的结合,而应只是语音。索绪尔认为语音是最好的思想表达手段,因为说话人从自己口中发出的声音与他的思想是一致的。与此相反,书写由于并不和作者或言者在一起,因而含混不清、意义不明,并且由于作者或言者的缺位很可能被误解,从而造成作者或言者本意的丢失。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的观点是典型的语音中心主义(Derrida 1997: 65)。语音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集中体现,它表现为,语音统治书写的二元对立体系。德里达坚决反对这种语音中心主义。在他看来,如果言语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重复,那么所产生的意义也随语境而发生变化。而且,在某种语境下,口语往往还是对已经写下的书写文字的复述,所以口语也不具有原初性和确定性(Derrida 1997: 65)。另一方面,德里达也不认为书写文字比口语更具有优势。在德里达看来,书写与口语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否则将再次造就一个中心。口语和书写文字一样,

任何一个都不更贴近说话人的思想或者说更真实地反映说话者的思想。一切符号都暂时存在于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这个网络没有中心,也不存在所谓的语言意义确定性。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反对一切中心,反对意义的恒定或是确定性。在德里达看来,书写文字并不是口语语音的附庸,在某种意义上,一切语言符号都是书写出来的文字: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文字是语音能指的书面能指,而语音能指又是一个概念所指的能指;根据索绪尔描述的语言差异系统,一切能指的意义只能产生于对其他能指的指涉,因此文字是能指的能指,他称为元文字(元书写)。另一方面,正像索绪尔认为的那样,语音是时间性的、一维的,口语在听觉上是一条时间线,而文字则是二维的既有空间性又有时间性,因此书写和语音具有不同的属性,不能说谁是谁的附庸。由此德里达解构结构主义语言学另一个中心观点——语音中心论,解构的目的就是要消解二元对立中的一元中心,去中心化和打破成员间的不平等关系,建立起事物间的二元互补,而非二元对立的新型关系。

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同样也未局限在语言领域。在德里达看来,结构主义的“语音中心主义”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德里达认为索绪尔语音中心论的本质是等级关系,语音与文字处于不同的等级。在德里达看来,柏拉图等人夸大语音而贬低文字的目的并不是出于纯语言上的考量,而是出于意识形态、心理与社会利益方面的考虑故意贬低文字。因为文字的解释可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所以在维护统治秩序和霸权的思想家眼里,文字在解释上的灵活性恰恰是制造思想多样性的源泉,因而他们极力贬斥文字的作用。而文字在德里达眼中则成为解构霸权话语和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利器。

德里达还揭示结构主义语言学“语音中心主义”所蕴含的“人种中心主义”本质。他指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比较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的不同,并认为表音文字是基本的文字类型,应被当作语言学研究的原始型。德里达认为,“索绪尔将言语系统与表音文字系统相对照,就像把它与文字的目标相对照一样,是在创造新的对立的等级体系,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西方人种中心主义”(德里达 1999: 12)。通过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德里达促使人们意识到历来被奉为哲学正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构关系。对语音中心论的解构有助于公正地对待其他民族的知识与

文化。

### 3 语言封闭性的解构

德里达的语言哲学还致力于解构索绪尔语言学关于语言是封闭的、稳定的结构,语义是确定的论述。打破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是静态的、共时的和封闭性的论述有助于探究语言的动态特征。德里达的“延异”思想是其解构语言封闭性、静态性以及语言共时研究方法的利器。德里达创造出一个法文词 *différance*(延异)。他想借这个词说明两层意思:一是 *différance* 的发音与 *différence*(差别)的发音相同,二者意义的区分来自于书写的不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语音在决定意义上并不比书写更优越,因而语音并不能决定书写文字;二是借 *différance* 与 *difference* 书写的不同来表达他主张的“延异”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差异”意义的不同。文字在时间和空间的二维性赋予“延异”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差异,主要表现在空间;第二层意义是延缓,主要体现在时间。德里达认为,“延异这个概念既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结构主义的,也不能被看成是生成的,相反,这样一种两者择其一的本身就是延异的‘结果’”(Derrida 1973: 45)。“延异”被德里达用来摧毁结构主义的语言研究方法——共时研究。在德里达看来,“延异”的无休止的游戏造就语言,语言中没有终极的、确定的意义。延异思想强调意义是动态的,处于不断否定自己的运动过程中,与在场或不在场没有关系。德里达认为索绪尔虽强调差异是意义产生的源泉,但认为这种差异是不变的,静态的。德里达认为意义是在不停地流淌之中,世间不存在终极不变的意义。德里达还使用“播撒”和“踪迹”来详细描述“延异”思想。“撒播”是空间上的“延异”。在德里达看来,文字具有播撒的功能。文字意义的传播并非直线传播的,也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所认为的从中心向边缘传播,而是像撒种子一样,不规则向四面八方飘散。在他看来,“延异”未能彻底诠释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和非终极性,只有“播散”才能将那种不确定性发挥到极致。德里达认为语义的播散来自于能指与所指的频繁转换,在一系列的转换中,新的意义不断产生并超越本来的意义,语言的丰富性也大大增强。“踪迹”是时间意义上的“延异”(Derrida 1973: 60)。在德里达看来,“踪迹”不是实体,它没有本己,是存在的印象。因此,“踪迹”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本源”。不存在的存在不断出现和消失在一个

没有替代物的链条中,呈现并延搁自身,从而使那种试图通过“踪迹”来寻求时间万物之源的企图永远落空。因此,真正存在的,“只有差别和踪迹的踪迹”(Derrida 1973: 68)。德里达通过“踪迹”批驳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在场性。德里达进一步指出,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两面,能指与所指并非逐一对应的;文本的能指往往没有一个在场的所指相对应,因此在场不能作为意义的归宿。符号的意义存在于能指的替换中。语言没有自己封闭的疆界,而是存在于一系列的生成转换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德里达用“延异”思想解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封闭性、静态性、意义的确定性以及语言研究的共时性。

德里达的“延异”思想对以尊重差异、推崇多元化为宗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延异”可解构封闭的二元对立体系,也可被后现代主义者用来解释世界的发展变化。在后现代主义者眼里“延异”推动着世间事物的发展变化并带动事物发展的多样性趋势,是变化和变革的动力。后现代主义者还借助“延异”思想消解西方中心霸权及话语权。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总是把在场者与他者分开,使双方截然对立。德里达认为“延异”可用来打破在场者与他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使在场者与他者互通互联。他说“延异”是一个物体到另一个物体、一个对立项到另一个对立项的位移和摇摆不定的过渡(Culler 1983: 78)。由于在场者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延异”,这就使在场者与他者相互渗透并且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所以“延异”不仅仅调和在场者与他者的对立,还将这种对立消解于水乳交融之中。事实上,东西方之间自从有交流之后,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东方之后,东西方就已经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他认为,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制造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但帝国主义者不可避免地使得东方和西方相互依存。帝国主义通过殖民统治,在殖民地留下自己的烙印,同时殖民地文化也对宗主国产生影响。德里达认为,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东方文化的“延异”,东方文化是对西方文化的“延异”。

德里达的语言哲学颠覆长期占据人们思想头

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等级森严的不平等、不公正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促使我们能以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来审视世间的一切。德里达从语言符号着手,解构符号意义观和语音中心论,其本质是揭示隐藏在语言符号背后的社会对立。德里达语言哲学的解构思想推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后现代社会思潮发展。德里达语言哲学所解构的二元对立思想有助于人们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进行简化和抽象化,方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但是,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存在着局限性,体现为对事物复杂性的忽视;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又与专制和权威联系在一起,导致严重的社会对立。德里达语言哲学的解构思想为推翻这种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肯定边缘的、非中心的他者存在的权利的社会运动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德里达批判语言结构封闭性的同时强调文本意义多样性、多元性、非中心性和不确定性。他反对僵化的同一,主张多元与差异。德里达用延异策略推翻任何意义上的绝对性、确定性和同一性意识。这种对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否定以及其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倡导体现出德里达语言哲学对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关照。总之,德里达通过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为解构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奠定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功不可没。

#### 参考文献

- 杜小真 张宁.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 雅克·德里达. 声音与现象: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Culler, J.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M]. London: Routledge, 1983.
- Derrida, J. *Margins of Philosophy*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2.
- Derrida, J.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Derrida, J. *Of Grammatology* [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收稿日期: 2014-04-27

【责任编辑 谢群】